

中亚草原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过程与特征^{*}

施越[◎]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中亚草原地区历史上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过程和特征。中亚草原地区自 12 世纪以降逐渐接受伊斯兰教影响。在传入该地区过程中, 伊斯兰教逐渐与本土的游牧生产方式结合, 吸收本土传统中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相应的治疗、占卜等仪式, 形成具有中亚草原地区特色的伊斯兰传统。19 世纪以降, 随着中亚草原进入现代化进程, 政教分离和国家管理宗教的格局逐渐形成。

关键词: 中亚草原 哈萨克斯坦 伊斯兰教 本土化

作者简介: 施越,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1991 年以来, 中亚地区成为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板块, 包含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中亚在地理上大致可分为北部的草原地区和南部的山地、绿洲和荒漠地区, 由此形成历史上北部以游牧为主、南部以农耕和商贸为主的生产方式格局。受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族群迁徙和融合等因素影响, 中亚各地区的伊斯兰教均经历本土化过程, 呈现显著的多元特征。

中亚草原的宗教传统是世界宗教研究的难点。因游牧社会的书写传统较弱, 草原地区历史主要为周边的定居人群所记载。因此, 研究中亚草原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程须从多语种史料和民族志文献中捕捉蛛丝马迹, 以跨学科视角来探寻历史脉络。我国学界此前不乏对哈萨克斯坦宗教政策的研究, 但相关文献侧重于描述其独立以来宗教管理机构设置沿革和去极端化的政策措施, 较少关注该地区本土化伊斯兰教的存在形态及其历史。^① 欧美学界对该地区的历史上各类宗教存在的形态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 但往往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②, 较少关注该地区伊斯兰教本地化进程的延续性。^③ 本文将该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过程分古代(11—18 世纪)和近现代(18—21 世纪)两个阶段论述, 尝试在勾勒各阶段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

一、古代中亚草原地区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

中亚草原地区自 12 世纪以降逐渐接受伊斯兰教影响, 而伊斯兰教在进入这一地区过程中也经历深刻的本土化过程, 形成与游牧生产方式和萨满教传统深度融合的本土化形态。这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亚洲文明研究专题”专项(编号: 21@WTA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宁:《哈萨克斯坦宗教事务管理体制》,《国际研究参考》2014 年第 4 期; 张宏莉:《哈萨克斯坦的宗教现状与宗教政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② Alexandre Bennigsen and S. Enders Wimbush. *Mystics and Commissars: 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Devin DeWeese, *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Baba Tükles and Conversion to Islam in Historical and Epic Tradition*. Penn State Press, 2010.

③ 相关讨论参见 Devin DeWeese, “Re-Envisioning the History of Sufi Communities in Central Asia: Continuity and Adaptation in Sources and Social Frameworks, 16th–20th Centuries,” in Devin DeWeese and Jo-Ann Gross eds., *Sufism in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2018, pp. 21–74.

形态表现在基本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述和习俗法律等诸多层面。公元8世纪初,伍麦叶王朝开始向中亚南部绿洲地区大规模进军,逐渐将伊斯兰教引入该地区。而锡尔河以北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部落则晚至12世纪才逐渐接受伊斯兰教。13世纪初蒙古西征后,草原地区的西部和北部为金帐汗国属地,南部和东部为察合台汗国属地。这一时期,以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为代表的旅行者观察到,统治草原地区的蒙古部落崇拜长生天和太阳、月亮、水、火、土地等各类自然元素。^①而中亚草原东部的城镇地区则存在景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并存的格局。^②14世纪上半叶,随着金帐汗国的月即别汗和察合台汗国的答儿麻失里汗皈依伊斯兰教,两地西迁的游牧部落也在首领的强制下逐渐皈依。此后,伊斯兰教成为中亚草原地区的主要宗教信仰。

上述关于伊斯兰教在中亚草原地区传播的经典叙述容易忽略传播过程中伊斯兰教自身的本土化发展。首先,在传播途径层面,苏非教团在伊斯兰教向中亚草原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早参与这一进程的是以艾哈迈德·亚萨维(生卒1103—1167年)^③为首的亚萨维教团。据传说,亚萨维生于锡尔河流域的伊斯费扎布(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城镇塞兰附近)。他以游牧民的语言创作诗歌,借用游牧社会熟悉的口传文学和音乐艺术传达宗教信条,并将草原游牧社会带有萨满教元素的集体仪式整合入教团的修行方式中。据称由亚萨维所作的诗歌集《智慧集》(Dīvān-i hikmat)反映了该教团的主要理念:亚萨维宣扬摒弃世俗欲望以抵抗邪念,但主张融入世俗世界,同时保持内心虔诚。^④在14世纪下半叶,中亚和西亚的征服者帖木儿曾下令修建亚萨维的陵墓。18世纪以降,哈萨克各部一些汗王及其亲属死后葬于亚萨维陵。由此,亚萨维陵所在地成为中亚草原各游牧部落最重要的圣地之一。

其次,在传播内容层面,中亚草原地区的伊斯兰教与游牧社会的萨满传统深度融合,形成本地化的伊斯兰传统。俄国学者巴西洛夫和法国学者加罗内以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教传统为参照对象,揭示了中亚草原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特征。^⑤萨满教根植于古代西伯利亚森林渔猎生产方式,随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地区民众的交往而传入草原游牧社会。上述两种传统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在基本信条方面,这一地区的信仰从自然崇拜逐渐转向以“安拉”为主神的多神崇拜体系。这一体系既不同于经院伊斯兰传统的一神信仰,也与萨满教传统有所区别。中亚草原伊斯兰传统既引入了对伊斯兰教基本信条、穆斯林神话人物和本地圣徒的崇拜,也保留了萨满传统中对火、土地和先祖灵魂的崇拜。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观念往往以新的术语为载体,在融合既有观念的基础上实现术语的替换。“安拉”“圣徒”(auliya)和“先祖灵魂”(arwah)等词汇均源自阿拉伯语,但其指涉的概念(天、神话英雄和先祖)则根植于草原游牧社会的传统。

其二,在宗教仪式层面,苏非教团修功中的“齐克尔”(dhikr)与萨满传统中的念唱祷词相融合,但功能上更侧重于治疗 and 占卜,而非苏非教团更关注的个人灵修。朝向麦加方向念诵、引述《古兰经》中的人物名称、经文和典故均逐渐成为草原地区各类宗教仪式的必要

①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3页。

②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48—251页。

③ 亚萨维的生卒年份参考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译本序言,参见Абусейтова М. Х. ред., Ясави Х. А. Хикметы Алматы, 2004. С. 1

④ Sultanovna K. M. "Reflection of humanist ideas in Khoja Ahmed Yassawi's ideology," *EP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IJRD)* 5, no. 3, 2020.

⑤ Басилов В. Шаманство у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М., 1992; Garrone, Patrick *Chamanisme et Islam en Asie Centrale*. Paris, 2000.

因素。但仪式用语往往混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本土语言。中亚草原地区从事占卜和治疗的人士被称为“巴合西”(baksy)。^① 根据其形式,前人学者将中亚草原的治疗术区分为“驱逐治疗”和“转移治疗”两类^②,其背后包含一套适应古代草原地区生产方式的疾病观,即人畜患病是因“魂”受到“恶灵”侵害所致。^③ 因此,驱逐治疗和转移治疗指的是用不同手段将恶灵驱逐出人体,或转移至自然界的其他领域。19世纪20年代俄国历史学家廖夫申曾记述,草原地区的一名“巫师”(koldun)^④为了折磨病人身上的恶灵而鞭打病人直至流血,并假装割开病人的喉咙。^⑤ 19世纪末俄国人类学家济瓦耶夫记载了驱逐治疗的具体场景:巴合西在展示自己可抵御火的高温之后,开始鞭打病人,有时甚至鞭打观众,旨在将恶灵从患者或可能依附的其他生命体中驱逐。^⑥ 转移治疗则借助动物内脏、毛毡甚至钱币等带有文化意涵的媒介将病人身上的恶灵转移到自然界或超自然领域。法国人类学家卡斯塔涅描述了20世纪的一次转移治疗实践:一名巴合西将羊肺切开两次,置于病人头上并喊道“拉动,拉动”,后要求病人旋转至精疲力竭而倒地。然后巴合西将羊肺从毡房顶部的通气孔(shanyrak)掷出,并大喊“出去,出去”。在毡房外等候的巴合西助手则拾取羊肺并掩埋。^⑦ 由此,病人体内的“恶灵”以羊肺为“容器”,穿过对于游牧民而言象征自然与超自然世界之间通道的毡房通气孔,最终掩埋于地下。

其三,伴随伊斯兰教而来的是中世纪阿拉伯—波斯文学传统的进入。这一传统往往包含对草原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正当化叙述。12世纪以降,中亚草原地区流传的苏非圣人传说逐渐文本化。此类文献大多以游牧部落或绿洲城镇的皈依为主题,作为故事主角的苏非圣人往往通过带有萨满教色彩的法术,借助超自然力量推动宗教信仰的传播。一份16世纪中期花刺子模地区的钞本《苏丹之友历史》(Tārīkh-i dūst sulṭān)呈现了此类苏非圣人传记的经典案例。这一文本叙述了金帐汗国月即别汗在巴巴图克勒斯(Baba Tükles)引导下皈依的故事。巴巴图克勒斯在月即别汗宫廷与异教术士论战,相互无法说服,故而两人以进入烤炉为赌注,存活者即代表信仰胜出。巴巴图克勒斯赤身但披上链甲,念唱齐克尔,与异教术士一同进入烤炉。后者瞬亡于高温,而图克勒斯在一段时间后走出烤炉。他毫发无损,但链甲已经被烫得通红,且继续在念唱齐克尔。^⑧ 这一叙述一方面呈现了16世纪咸海南部绿洲地区知识分子对草原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带有萨满教印记的本土化伊斯兰传统已经为部分绿洲地区宗教人士所接受,即部分来自文化中心的人文阶层不再视此种多元融合的文化形态为异端。

其四,在习俗和法律层面,尽管草原地区游牧社会普遍尊奉哈乃斐法学派,但实践中

① Zarccone, Thierry and Angela Hobart, eds. *Shamanism and Islam: Sufism, healing rituals and spirits in the Muslim worl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p. XXV.

② Patrick Garrone, *Chamanisme et Islam en Asie Centrale*. Paris, 2000, pp. 51–65.

③ 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④ 因史料和术语的语种来源较多,为便于读者查索相关文献,本文将来自俄文或其他采用西里尔文字语言的术语转写为拉丁文,以斜体标注非英语的外文术语。

⑤ Лёвшин А. И.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Казачь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ы степей. Т. 3, СПб., 1832. С. 63–64.

⑥ Диваев А. А. Баксы, как лекарь и колдун // Из области киргизских верований. Казань, 1899. С. 8.

⑦ J. Castagne, 'Magie et exorcisme chez les Kazak-Kirghizes et autres peuples turks orientaux,' *Revue des Etudes islamiques*, 4: 1, 1930, p. 69.

⑧ Devin DeWeese, *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Baba Tükles and Conversion to Islam in Historical and Epic Tradition*. Penn State Press, 2010, pp. 155–158.

仍以部落习惯法为准，包括突出汗族与和卓阶层的特权、以肉刑为主要刑罚方式、以牲畜为经济赔偿形式等。^①哈萨克传统社会分为白骨（*aq süiek*）和黑骨（*qara süiek*）两阶层。白骨阶层包括有资格成为汗和苏丹的成吉思汗后裔（*töre*），以及自称伊斯兰教先知后裔的和卓家族（*qoja*）。^②黑骨阶层则指代白骨和奴隶之外的哈萨克部落平民。白骨阶层在哈萨克社会中享有诸多特权，侵犯其名誉或身体将遭到比一般命价更为严厉的惩罚。例如，杀害和卓，则凶手的亲属须支付相当于7名男性的“命价”（*kün*）；言语侮辱和卓则处以相当于9头家畜的罚金，殴打和卓则处以相当于27头家畜的罚金。^③由此可见，一方面，15世纪以降，代表伊斯兰教权威的和卓在游牧社会中形成了具有法律特权的阶层。这充分体现了数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在中亚草原地区传播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和卓阶层的法律特权仍保留游牧社会传统的形式，即以“报复法”（*Talionic Law*）为观念基础、以牲畜为经济赔偿的计量单位。可见，伊斯兰教在草原地区的本土化呈现为新宗教符号与传统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形态。

二、现代转型背景下中亚草原地区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19世纪中期，俄国的征服将中亚草原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随着俄国逐步在中亚草原建立统治机构，现代意义上“教法随国”的局面逐渐形成。^④19世纪中期，俄当局在中亚草原地区设立行政机构，以基层选举和赋役制度为抓手，将部落精英规训为基层官僚。与此相应，俄当局将此前游牧社会基层负责司法的毕（*bii*）制度化为“民族法庭”并纳入俄国司法体系，依照习惯审理哈萨克人之间的日常民事案件。^⑤19世纪末，随着现代技术的引入，中亚地区的国家机关逐渐具备统计人口信仰状况、监管宗教活动机构和设施以及通过文教机构传播现代政教观念的职能。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民族共和国的建立、国家能力的强化、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工业化以及草原地区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改革和现代国民教育的普及，现代国家管理宗教活动的基本格局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

其次，19世纪至20世纪中亚草原经历游牧社会的定居化和族群结构的多元化，促成当代这一地区更为世俗和包容的宗教传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启动后，俄当局逐渐从此前限制农民向中亚草原迁徙转向鼓励开垦边疆。1896—1916年间，超过一百万俄欧移民涌入中亚草原。这一进程重塑了草原地区的族裔结构、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并显著推动了游牧社会的定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草原千百年来游牧社会的形态。^⑥此后，中亚草原地区的定居化和族裔人口多元化趋势随着20世纪中期的工业化、集体化和垦荒运动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1991年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继承并发展了此前的官方宗教管理体系，并根据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不断调整宗教政策。根据200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数据，哈萨克斯坦境内约有130多个民族。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为1123.79万人（占哈总人口的70.2%），信仰基督教的为419.01万人（占26.2%），信仰佛教的1.46万人（占0.1%），信仰其他宗教的人

①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1—372页。

② Лёвшин А.И.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Казачь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ы степей. Т. 3, СПб., 1832. С. 11-12.

③ Лёвшин А.И. Описание Киргиз-Казачьих или Киргиз-Кайсацких орды степей. Т. 3, СПб., 1832. С. 171-172;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8页。

④ 李林：《“教法随国论”——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本土经验与普遍意义》，《文化纵横》2018年第1期。

⑤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9—80页。

⑥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第155—157页。

口共计 3.01 万人（占 0.2%）。^① 为保证境内多族群、多宗教信仰人口和谐共存，哈萨克斯坦采取诸多立法和行政措施，为境内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在 1993 年和 1995 年两版宪法中均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民主的、世俗的国家”。^② 1995 年宪法的第五条明确规定禁止挑起宗教仇视的活动，禁止宗教基础上的政党活动。而独立后不到两个月（1992 年 1 月）颁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法》则明确每位公民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承认宗教宽容和宗教间和谐的重要性。^③

为应对世纪之交极端主义思潮对中亚地区的挑战，哈萨克斯坦在 2005 年前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境内宗教活动的治理。2005 年 2 月 18 日，哈议会通过《反极端主义法》，赋予当局在认定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方面广泛的权力。^④ 2011 年 10 月 25 日生效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法》取代了 1992 年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团体法》，以信徒人数等指标将宗教团体分级，要求哈境内全部宗教团体重新注册登记。^⑤ 在重新登记后，哈国宗教派别从此前超过 46 种减少到 17 种，宗教团体数量从超过 5000 个减少到 3088 个，其中伊斯兰教相关团体 2228 家（99% 属逊尼派）。此外，宗教团体须持有官方审批的传教许可才能开展在限定空间开展传教活动，而外国宗教团体尚需提供来源国合法注册文件方可向哈当局申请注册。

与立法工作相匹配的是行政机构的创设与调整。2005 年，哈政府在司法部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2011 年，哈政府新设立部级单位宗教事务局，将之前分属各部涉及宗教管理事务的职能进行整合，负责国家宗教政策的研究、宗教机构的注册管理和与主要宗教团体的日常联络工作。哈宗教事务局下设由宗教学家组成的研究中心，负责审查进口宗教书籍。宗教事务局下辖的文化与宗教国际中心主要负责研究国内外宗教形势，开展宗教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该中心承办的“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最初由哈国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2003 年发起，旨在邀请世界各主要宗教的代表共同表达宗教和谐和睦的价值观。这一机制每三年召开一届大会。前六届（2003—2018 年）均由哈国总统出席开闭幕式，由上议院议长担任秘书长和大会主持人。

在上述措施的支持下，本土化的伊斯兰传统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保存和发展。例如，融合了伊斯兰和萨满教传统的治疗术依然存在于哈国民间。20 世纪 90 年代，在剧烈的私有化进程之中，哈国当局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撤出，而思想文化领域则尝试复兴主体民族传统，由此促成替代性的传统治疗术复兴。^⑥ 这一时期，“巴合西”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指代各类治疗师、萨满、苏非、占卜师甚至库布孜演奏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哈国存在女性巴合西。^⑦

① The Agency on Statistic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esults of the 2009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nalytical Report, Almaty, 2009.

② 于洪君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十二届最高苏维埃第九次会议 1993 年 1 月 28 日通过）》，载自《外国法译评》1994 年第 1 期；于洪君，王向雷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5 年 8 月 30 日全民公决通过）》，《环球法律评论》1996 年第 1 期。

③ Закон № 1128–XII. О Свободе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я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 https://online.zakon.kz/Document/?doc_id=1017578&pos=6;-106#pos=6;-106.（阅读时间：2022 年 3 月 29 日）

④ Karagiannis, Emmanuel.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Kazakhstan: Hizb ut–Tahrir al–Islami.”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3, no. 2 (2007): 297–322.

⑤ 张宁：《哈萨克斯坦宗教事务管理体制》，《国际研究参考》2014 年第 4 期。

⑥ Sarsambekova, A. S., Botbaybekova S. K., and Sarsambekov E. S. “‘Ata Zhol’ In Kazakhstan: Spiritual Revival through Neo–Shamanism.” *The Anthropologist* 20, no. 3 (2015): 462–467.

⑦ Vuilleminot, Anne–Marie. “Muslim Shamans in Kazakhstan” in Thierry Zarcone and Angela Hobart, eds. *Shamanism and Islam: Sufism, healing rituals and spirits in the Muslim worl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p. 59.

此类治疗术主要面向那些难以通过正规医疗途径治愈、且因疾病而不易融入社会的病患。其治疗的方式包括巴塔 (*bata*)^①、齐克尔和朝觐等。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察,作为治疗术一部分的巴塔一般包括表现同情、解读病因、责备病患和预示未来四部分。部分祷词援引诸如伊斯兰教先知和苏非圣人的名字等文化符号。当代哈国的巴合西将齐克尔与乐器和舞蹈结合,作为一种治疗病患的方式。一位人类学家记载了一名叫库瓦特 (*Kuat*) 的巴合西为一名聋哑男孩和一名聋哑婴儿举行齐克尔的仪式场景:“参加者围成一圈,库瓦特站在西南方位(即正向)。在他身后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古兰经》和其他经典以及布料、编织物、袋子、乐器,以及刚分娩绵羊的脐带。巴合西以手敲打大鼓开始仪式。仪式的参与者围成一圈。在整个仪式进行期间,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候开始原地跳舞,并重复念唱清真言的前半段……巴合西库瓦特会走到圆圈的中心,做一系列手势和动作,象征召唤鹰和骆驼等动物协助治疗。”^②

与中亚草原古代的朝觐传统相似,当代哈萨克斯坦民间依然保留本地化的朝觐习俗。在草原地区,朝觐往往指代赴地方性的圣徒陵墓朝圣,而非前往麦加。此类圣徒陵墓朝觐的仪式往往包含在树木上系上碎布、念诵经文、献祭食物、饮用“圣水”以及守夜等环节。朝觐的地点不仅仅包括苏非或圣徒墓地,甚至诸如塔姆加勒 (*Tamgaly*) 和捷列克特·奥里耶 (*Terekty Aulie*) 岩画遗址也被认为是圣地。^③ 其中,赴亚萨维陵的朝觐之旅被称为“先祖之路” (*Ata Zhol*)。此类朝觐活动往往有相对固定的线路和相应的仪式。线路所经圣墓往往由守墓人 (*shirakshi*) 为朝觐者念诵经文和祷词,而守墓人主要依赖朝觐者的施舍维生。值得注意的是,受19世纪以降的现代化进程影响,当代哈国的传统治疗者不再强调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进行治疗或占卜仪式,也大多摒弃了古代萨满仪式中的暴力元素。

三、结语

正如金宜久先生所论,“人为宗教、尤其是世界性宗教,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地方化和民族化的问题。”^④ 伊斯兰教在中亚草原的变迁同样体现了世界性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在古代,传入草原地区的伊斯兰教与游牧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吸收游牧传统中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治疗和占卜等仪式,形成具有中亚草原地区特色的伊斯兰传统。19世纪以降,政教分离和教法随国的格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中亚草原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案例也表明,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消解基本信仰、宗教功课和伦理规范的重要性,“而是在伊斯兰教许可的范围和限度内,为适应其传播地域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做出某些可能的调节或调整,与当地民族的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相和谐、相融合。”^⑤

(责任编辑 王 伟)

① “巴塔”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祝福”或“祈求”,指代在婚丧嫁娶等重要仪式场合念诵祷词的仪式。

② Vuillemenot, Anne-Marie. “Muslim Shamans in Kazakhstan” in Thierry Zarcone and Angela Hobart, eds. *Shamanism and Islam: Sufism, healing rituals and spirits in the Muslim worl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pp. 62–69.

③ Lymer, Kenneth. “Rags and Rock Art: the Landscapes of Holy Site Pilgrimage in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World archaeology* 36, no. 1 (2004): 158–172.

④ 金宜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

⑤ 张志刚:《世界伊斯兰教史上的本土化例证综论》,《中国穆斯林》2021年第4期。